論　著

革命、女權與史學：《神州女子新史》論析*

衣　若　蘭**

摘　要

徐天嘯(1886-1941)所著之《神州女子新史》正續編(1913)，出版時間早於中國婦女史名著——陳東原之《中國婦女生活史》(1928)，被稱爲是首部「有系統研究自古至清末民初的中國婦女史」，惜罕受注意。本書特點大致有三：一、反滿種族革命的敘史；二、以婦女「史」而非以「閨範」來喚醒女性、伸張女權；三、利用新式的章節體而非紀傳體來書寫歷史。本文嘗試分析《神州女子新史》之內容，探究其在女權運動與史學史上的意義。期盼

*　本文承國科會補助研究經費，謹此致謝。初稿曾宣讀於「第七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社會史研究之新視野」，臺北：東吳大學，2009.5.22-23。蒐集資料與寫作期間，承蒙臺灣、上海與常熟等地多位朋友的協助與建議，特別感激周文曉先生、馮筱才教授、徐成治先生，以及游鑑明教授、連玲玲教授、許慧琦教授、陳建守先生等人。本刊兩位匿名審查教授提供寶貴之修正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特致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此研究能對於瞭解 20 世紀初期以革命語言撰著的中國婦女史與以寫史來倡議女權的作法，有所助益，並進一步省思新史學氣氛下的婦女史書寫。

關鍵詞：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婦女史、女權、革命、史學

一、前　　言

「一嘯申女權萬言，著新史；
再嘯蘇國魂言論，警當世。」[1]

民國 66 年鮑家麟教授因張永堂、張勝彥兩位教授的協助，尋得民國 2 年上海神州圖書局出版的《神州女子新史正續編》，由臺北食貨出版社翻印，臺灣學界乃得見此一部 20 世紀初期的中國婦女史專著，其後稻鄉出版社於民國 82 年重印。[2] 然而，遺憾的是，這本被稱爲是首部「有系統研究自古至清末民初的中國婦女史」，[3] 成書迄今將近百年，卻一直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4] 作者爲清末民初常熟文人徐天嘯(1886-1941)，他與許多來自當地的文人一樣，活躍於民初上海文壇，但未若其胞弟鴛鴦蝴蝶派大師徐枕亞(1889-1937)受到廣泛的注意。[5]

1 吳雙熱題，民國元年 4 月，見徐天嘯著，鮑家麟編，《神州女子新史》（臺北：稻鄉出版社，1993），卷頭，未標明頁碼。

2 鮑家麟，〈重印前言〉，《神州女子新史》，頁 3。

3 鮑家麟，〈序　中國第一部婦女史——天嘯的神州女子新史〉，《神州女子新史》，頁 5。

4 目前僅見鮑家麟為本書重印時作序，將本書的特點作了扼要的提示，見〈序　中國第一部婦女史——天嘯的神州女子新史〉，《神州女子新史》，頁 5-12。可惜仍未引起史學界對徐天嘯或《神州女子新史》之研究興趣。

5 周文曉所編的《徐天嘯與徐枕亞研究資料》（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3），是目前唯一有關徐天嘯生平之參考，本書編輯初衷是整理徐枕亞的相關資料，後因考量徐天嘯也是南社社員，才將其兄弟資料合編（見序，頁 2），因此相關徐天嘯之資料不及全書五分之一的篇幅。

徐天嘯，號嘯亞，字風，別名天涯淪落人、秋魂室主，晚號印禪。1886 年 12 月 6 日生於江蘇常熟。母親譚氏，父親徐懋生為學館名師。1907 年徐天嘯與姚吟秋女士結為連理，夫婦鶼鰈情深，有詞曰：「替眉描武妝臺傍，倦繡鴛鴦弱線拋；一卷神州新女史，簪花格子手親鈔。」[6] 兩人遊戲妝臺，書法抄寫《神州女子新史》，夫妻之恩愛可見。元配逝世後，1921 年娶鄒志雲(1901-2003)為續弦，生有一女徐懿文(1923-)和一子徐成治(1924-)。[7]

圖 1：徐天嘯小影（時間不詳，徐成治先生提供）

徐天嘯在 1901 年（16 歲）參加童生試，補諸生。他負有強烈的革命熱情，1912 年入上海民國法律學校，接受革命思想，後加入國民黨。[8] 徐

6 徐天嘯，〈悼秋詞〉，《天嘯殘墨》（臺北：廣文，1980），頁 65。

7 本文關於徐天嘯之生平，多得力於周文曉所編的〈徐天嘯年表〉，《徐天嘯與徐枕亞研究資料》，頁 1-7，以及徐天嘯子徐成治先生口述，特此致謝。處於清末民初轉折之際的徐天嘯之經歷與論述，值得進一步研究，由於相關內容在時間上多為《神州女子新史》成書之後，與本文關係較疏，筆者將另文探討。

8 徐鄒志雲，〈先夫徐天嘯事略〉，《徐天嘯與徐枕亞研究資料》，頁 8。

天嘯爲《民權報》（上海，1912.3-1914.1）[9] 寫政論，宣揚民權主義，批評專制政權，後因反袁世凱政府而遭禁刊。[10] 1917 年他加入南社，後曾投身於軍界，繼任考試院秘書。1941 年 11 月 24 日病逝於重慶，享年 56 歲。[11]

徐氏昆仲情誼頗深，徐天嘯曾推薦枕亞入《民權報》與南社，並與之主持《小說叢報》（上海，1914.5-1919.5）等報刊，兩人詩、序贈答頻繁。他倆與吳雙熱義結金蘭，人稱「海虞三奇人」。徐天嘯作品有《天嘯殘墨》、《神州女子新史》、《天涯淪落人印話》，小說《湖上百日記》，還有劇本《自由夢》等。文學派別上，他被歸爲「鴛鴦蝴蝶派」，但他的作品實以現實關懷爲主，學者將其寫作以 1915 年爲界，認爲前期作品主要特色爲抨擊專政、宣揚民主、關心現實；後期則著重在個人情趣與自我悲歡，轉爲消極哀怨。[12]《神州女子新史》即屬於他前期的作品。

徐天嘯作新史「申女權萬言」，[13] 若從清末民初女權運動的脈絡來看其作品，過去相關研究已爲我們奠定相當之基礎，例如林維紅從推翻清政府活動與不纏足運動，觀察近代中國女權發展中女性的參與以及運動對女性生活的改善。[14] 鮑家麟則從太平天國時期對女性的態度與政策、廢纏足、興女學與婦女從軍、參政運動等方面梳理近代中國婦女運

9 該報被視為自由黨之喉舌。自由黨屬同盟會系中較為激進者，主張地方自治與倡導實業等，主要人物有：天鐸報社長李懷霜、周浩、戴傳賢（天仇）、孫文、黃興等人。參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再版），頁 554。然《民權報》自稱其編輯重要人物多未入自由黨，屬獨立性質，見《民權報》，1912 年 4 月 17 日，版 1，廣告。

10 鄭逸梅，〈《民權報》與民權出版部〉，《書報話舊》（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53。

11 徐鄒志雲，〈先夫徐天嘯事略〉，《徐天嘯與徐枕亞研究資料》，頁 14-15。

12 范培松、金學智主編，《插圖本蘇州文學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頁 1513-1514。

13 吳雙熱題，民國元年 4 月，見《神州女子新史》，卷頭，未標明頁碼。

14 林維紅，〈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動(1905-191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林維紅，〈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動(1905-1912)〉，收於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129-178；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臺大歷史學報》，期 16（1991 年 8 月），頁 139-180。

動之大勢。[15] 其次，柯惠鈴以性別角度而非從國家政黨的立場重新檢視婦女運動，補充過往相關婦女與政治研究中較不受重視的女性主體問題，認爲近代中國女權及婦女運動的發展是被政治權力所召喚出來。[16] 另，諸位學者共同反思百年來的中國女權運動，重新解讀《女界鐘》(1903)，發現本書實爲從男性主體出發的「男界鐘」，反映了中國男性面對帝國主義、國族變遷焦慮之跡象。[17] 那麼《女界鐘》出版十年之後的《神州女子新史》，在 20 世紀初期中國女權運動的脈絡，又是何種特色與位置？

再者，從婦女史書寫的角度觀察，《神州女子新史》出版的時間早於以紀傳體寫作方式的中國末代王朝史《清史稿‧列女傳》(1914-1928)，[18] 意即當時沒有清代正史〈列女傳〉可供參考；而本書也比人們熟知的中國婦女史名著——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1928)之完成，早了十五年，值得注意。關於民初婦女史研究之趨向，杜芳琴曾爲我們提供了粗略的輪廓，她將婦女史寫作的問題放在學術發展與社會文化的脈絡來看，提綱挈領地指出 1919 至 1945 年婦女史研究的階段性特色，分別爲：「壓迫—解放」模式、「問題—改良」模式、「英雄—貢獻」模式，[19] 而這

---

15 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收於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2），頁 266-295；另陳三井主編，張玉法總校訂，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第 1 章。

16 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17 高彥頤，〈把「傳統」翻譯成「現代」：《女界鐘》與中國現代性〉，收於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1-36。

18 《清史稿》的編纂時間為 1914-1928 年，其中〈列女傳〉由金兆蕃(1868-1950)負責統整，相關討論參拙著，〈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臺大歷史學報》，期 41（2008 年 6 月），頁 165-172。

19 她指出：1919 年新文化運動引發了思想啟蒙、社會革命(1919-1927)，在婦女史研究的關注點上是「壓迫—解放」模式的婦女史（以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為代表）。其後進入「社會改良主張時期」(1927-1937)，將婦女作為社會問題，她稱之為「問題—改良」模式的婦女史（以王書奴《中國娼妓史》、陳顧遠《中國婚姻史》為代表）。之後再到「民族救亡運動時期」(1937-1945)當時婦女史的研究採取「英雄—貢獻」模式，宣揚女英雄（如：花木蘭、秦良玉等）為主要趨勢。參杜芳琴，〈中國婦女史學科化建設的理論思考〉，《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天

樣的觀點若能配合史學發展脈絡的討論，詳加證明、辯析，將更能突出其意義。夏曉虹則從期刊《女子世界》來看晚清女報的「性別觀照」，提供不少晚清女性報刊史的相關資訊；[20] 她也關心女報之「傳記」欄，為我們重構晚清女性典範的多元性圖像。[21] Joan Judge 的新著則探討中國女性傳記如何被男女性作者、教育家、社會改革家等用來作為建構現代與國族的工具，有精闢的見解。[22] 可惜以上皆未將《神州女子新史》納入參考與討論。

《神州女子新史》一書正續編共約二十餘萬言，民國 2 年 4 月由上海神州圖書局發行。校閱者為神州圖書局編譯所，代印者國光書局印刷所，分發行所則為神州圖書分局，[23] 時定價大洋一元五角。[24] 以吳雙熱

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 1。

20 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觀照——《女子世界》研究〉，《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8 月），頁 67-113。

21 夏曉虹，〈晚清女性典範的多元景觀——從中外女傑傳到女報傳記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 年 3 期（2006 年 5 月），頁 17-45。

22 Joan Judge,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 神州圖書局創立於 1912 年 8 月 1 日上海四馬路惠福里 30 號，以編輯「共和時代應用各書」如：農事、工事、商業、學生、女子、家庭、軍事、社會等等相關實用或教科書為主，見《民權報》，1912 年 8 月 1 日及 8 月 8 日，版 1，廣告。有關神州圖書局之經營，仍有待進一步考察，相關清末民初出版研究都未提及本出版社，如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但可以確定的是，它與知名的上海「神州國光社」實為不同的兩家出版社，不宜混淆。按神州國光社於 1901 年創立，由黃賓虹、鄧實主辦，國光書局亦由鄧實所創辦，負責印刷神州國光社的相關圖書，查神州國光社與神州圖書局社址不同，神州國光社的社址兼總發行所在五馬路河南路，而神州圖書局則在上海英界四馬路，國光書局印刷所則在六馬路東新橋北吉慶坊，參魯迅，〈准風月談後記〉，《准風月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 179。

24 1913 年上海銀圓的購買力，一銀圓可以買 30 斤大白米，8 斤豬肉、10 尺棉布，見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頁 348、354。又，一大洋約同 70 元人民幣（2007 年為準），見陳明遠，《何以為生——文化名人的經濟背景》（北京：新華書局，2007），頁 223。因此，本書價格約現在的台幣 525 元。以當時的書價來看，《婦女雜誌》上教科書廣告平均在 4 角到 1 元 5 角之間。1914 年小說叢報出版的小說定價多為 6 角，當時女子教科書，定價約略從 8 分（如初等小學《女子修身教科書》）到 8 角（女子中學師範《縫紉教科書》）均有，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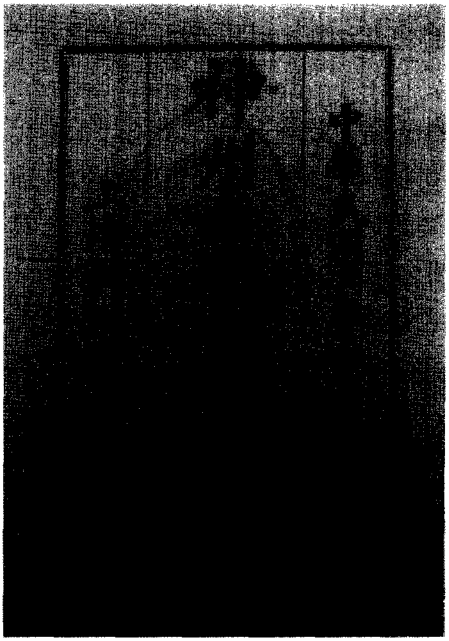

圖 2：《神州女子新史》書名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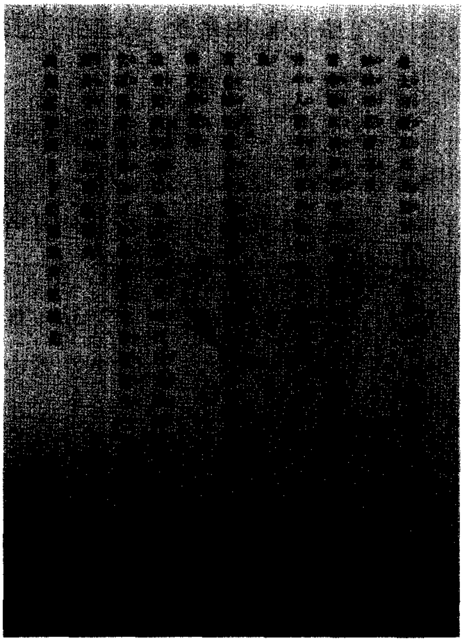

圖 3：《神州女子新史》題詞

的題辭時間看來，本書「正編」或許在民國元年 4 月左右即已完成；[25]「續編」之〈發端〉著於同年 11 月，可見兩編寫作間隔不久，全書約在 1913

商務印書館女子必讀之書廣告，《婦女雜誌》，卷 1 期 6（1915 年 6 月 5 日）。而徐天嘯的劇本《夢裡鴛鴦》定價則為 3 角，見《雙料伍銅元》，期 16（1914 年 12 月 1 日），廣告。另，1915 年創刊的《婦女雜誌》半年份共 1 元 3 角半，見李曉紅，《女性的聲音——民國時期上海知識女性與大眾傳媒》（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頁 48。由教科書與期刊等定價看來，《神州女子新史》一書當時的定價並不低。不過同年上海黎光社出版歷史小說《唐新語》，洋裝布面字金定價也是大洋一元五角，見《民權報》，1912 年 4 月 26 日，版 4，廣告。《神州女子新史》亦為洋裝布面字金，因此這樣的定價大概也不是特別高。

25 據徐天嘯子成治所言，本書於 1909 年即出版，出版社不詳。徐成治口述，衣若蘭訪問，2009 年 6 月 23 日，上海徐宅。而徐枕亞曾言：「徐君天嘯前有中國女子新史之著。上自太古，下至明代，久已脫稿。」《民權報》，1912 年 11 月 14 日，版 1，廣告。表示本書正編部分在 1912 年 11 月之前已成，正、續兩編撰著於不同時期，但正編於此之前是否已刊印，仍待查證。

年初成稿。[26] 據說徐天嘯僅費了一年的時間即完成本書，被稱是「爲中國千百年來女豪傑作一部信史」。[27] 這部書在20世紀初期的意義何在，值得我們進一步考察。

要之，徐天嘯以婦女作爲歷史論述的憑藉，此種寫作方式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有何意義？本書的內容主旨與結構安排是基於何種構想？徐氏的女權論述與編纂體例又有何特色？其對「女子史」的看法如何？其史學寫作與傳統史學的特質、新史學思潮之間如何呼應？何謂「新史」？「新史」對照於舊史有何不同？基於以上疑問，本文嘗試分析其女性史寫作在女權運動與婦女史與史學史上的意義，期能更瞭解近代中國女性史書寫之發展與特色。

二、美哉神州：種族意識下之敘史

徐天嘯自言其兩大天職爲：一、「欲研求民族數千年進化之實跡而提倡民族之主義。」二、「欲發揮吾民族數千年女界偉大優美之歷史，而提倡女權之發展。」[28] 也就是本書的兩大見地爲：「發揚民族」與「唱[倡]導女權」，[29] 並將民族主義與女權思想結合。徐天嘯未曾留洋，他藉由閱讀瞭解西方國家歷史文化，發現女子投身於社會與否實與「世界之進化」、「民族之強弱」關係密切，而世界之女傑「其旨趣之高尚，其思想之奇特，其主義之獨立，其事業之偉大」，令他讀了心生敬愛而崇拜不已。[30] 他在書中序言曾提到法國孝女路衣慈（原文不詳）、友愛並且善事其兄的罷賴茵（原文不詳）、才女盧月（疑爲 Lucile-Aurore Dupin, 1804-1876）、關懷社會的梅曉若（Louise Michel，或稱路易美世，1830-1905）、

---

26 1912年12月底的《民權報》仍可看到本書「徵集革命期間女子事蹟」的廣告，可見當時本書續編仍未完稿。

27 吳雙熱，〈序二〉，《神州女子新史》，頁1。

28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2。

29 吳雙熱，〈序二〉，《神州女子新史》，頁2。

30 徐天嘯，〈序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1。

貞德(Joan of Arc, 1412-31)、[31] 熱愛平等自由主義的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 1754-93)，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熱心公益的美國女性批茶(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96)、俄國虛無黨女傑蘇斐雅(Sofia Perovskaia, 1835-81)，以及具有軍國精神、尙武思想的斯巴達婦女。[32] 可見世界婦女事蹟對於他寫作中國女性史的刺激。

然他並非一昧地崇洋，他一方面推崇西方世界的進步，一方面也說中國是「全世界惟一無二之偉大一民族」。[33] 曾有人質疑他，若要倡導女權，何不以西方女豪爲主題來勸勉感化中國女性？徐天嘯則認爲中國女性楷模亦多，並舉相當多的例子來證明之。[34]

然「新史」爲何而作？《神州女子新史》的新書廣告有言：

> 蓋以精州立國最古，黃帝以來四千餘年歷代英豪賢哲名人鉅子皆有正史、稗史以傳後世。獨巾幗賢豪修史者往往刪而不錄，錄而不詳，此蓋狃於輕女重男之積習，以致千百神之女賢豪湮沒不彰，良深浩嘆。[35]

也就是有感於過去重男輕女，修史者每忽略女子，不是「刪而不錄」，就是「錄而不詳」，許多巾幗賢豪之名，往往湮沒不聞。因此神州圖書局「欲爲我神州女同胞發異彩之光明」特聘徐天嘯「將四千餘年之賢母妻，徇身徇國、盡節盡孝之諸先哲，博採續編，往古來今，凡有關於世道人心者，無不詳細敘述。」[36] 作者認爲：「古來奇女子對於國家未嘗無事業，即亦未嘗無密切關係。苟彙其事實，集厥大成，蔚厥大觀，可成一部莊嚴燦爛優美圓滿之女史。」[37] 足見其積極從歷史中找尋中國古今女子貢獻的態度。作爲一位歷史紀錄者，徐天嘯對於史上許多女性事

31 Joan of Arc，當時也翻譯作如安、若安、若安達克、如安打克孃。
32 徐天嘯，〈序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2-3。
33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2。
34 本書中唯一一位外國女性傳記為康得利夫人，徐天嘯認為她助孫中山於倫敦蒙難之時，有功於民國，故破例書之，見《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55。
35 見《民權報》，1913 年 7 月 9 日，版 1。
36 見《民權報》，1913 年 7 月 9 日，版 1。
37 見吳雙熱，〈序二〉，《神州女子新史》，頁 1。

蹟之不爲人知，十分感慨，他曾言：「中國自古代以來，其名傳青史之孝女、俠女、烈女、貞女、賢女、奇女，固已不乏其人。」惟魏之潘夫人、唐之劉婦人，人不知曉，實爲女界之羞。[38] 另外還有許多無名英雌，爲國犧牲者，未能記載下來，實爲一大缺憾，其曰：「嗟嗟，吾國女子之有雄魂、有毅魄、有冒險進取之至性、有救國利民之熱腸者，不知其凡幾。惜其姓氏不傳，而爲無名之英雄，是亦吾女史之缺恨也。」[39] 展現了他對於爲女性留名留史之急切。

整體而言，本書列舉上古至民國元年數千年來之奇女子事蹟，正續編共搜錄約 390 人。他是在晚清對全球歷史的認識下，反思國族的過去與未來，希望以之刺激當代女子之志氣與精神。

本書爲何題名爲「神州」而非「中國」？徐天嘯在書中未明言，神州固然是中國之意，然從書中用字遣詞與時人之用法推測，神州在本書或有民族／種族的意涵。[40] 他多次在書中稱「美哉神州」、「神州陸沈」一語；書後陸氏之跋亦曰：「美哉神州，美哉新造之神州，美哉神州之流血史」。[41] 推翻致使神州流血、陸沈的異族，恢復神州之美，實爲徐天嘯的夢想。

「神州」一詞在清末民初的使用頗爲頻繁，辛亥革命期間女子勸捐會啓有曰：「吾神州女同胞素以慷慨俠烈聞天下」[42] 即用神州代表中國。當時一些報刊與社團、出版社也普遍使用此名稱，例如：《神州女報》(1907.12-1908.1)、《神州日報》(1907.4-1946)、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

38 徐天嘯，「女史氏按」，《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09。

39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58。

40 本文民族與種族時而混用，實因近代中國之種族與民族的概念往往重疊，革命派強調種族的民族主義，藉此激起種族團結思想。清末至 1915 年以前，民族主義者有關於血統和土地的概念限於政治舞台，直到新文化運動以後又有比較廣泛的使用。參馮客(Frank Dikotter)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 100；112-114。而關於近代種族論述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詳參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 28（1997 年 12 日），頁 1-77。

41 陸麗芳，〈書後〉，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2。

42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84。

（1912.3 成立）、神州女界參政同盟會（1912.3 成立）、神州國光社（1901 年創）、神州圖書局等等。其中《神州日報》主張「外夷內夏之大防，昭垂雲漢」，[43] 實隱含了種族主義的想法。《神州女報》由女同盟會員所創，內容也以種族革命爲主要訴求。因此，本書內文中雖然「神州」與「中國」二詞並用，然其使用「神州」一詞作爲書名，或許有強調古老的、未受異族統治的、屬於漢族的「中國」，在使用上含有民族／種族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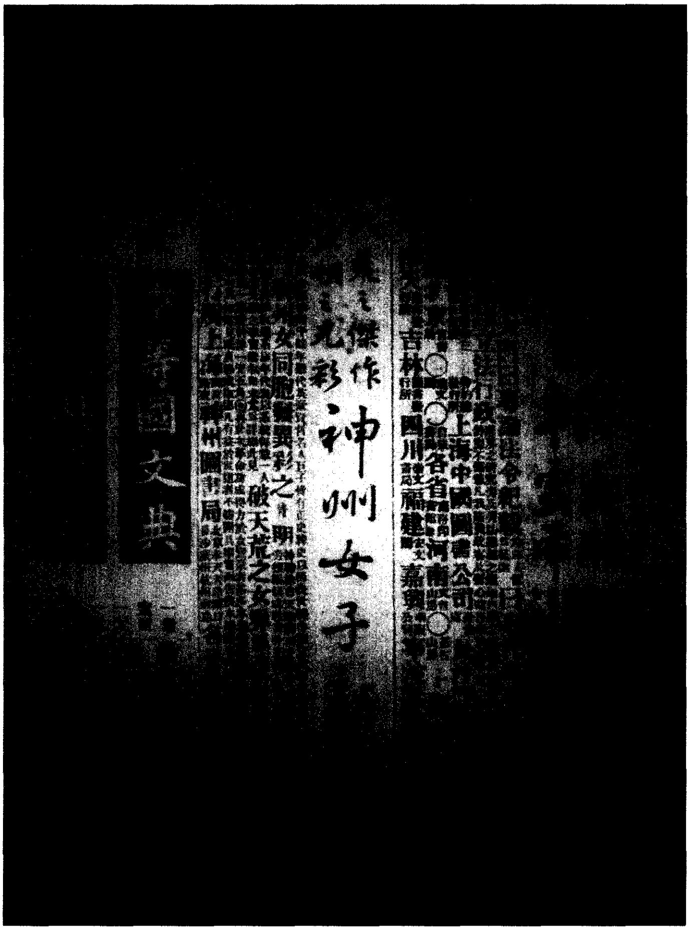

圖 4：《神州女子新史》新書廣告（上海《民權報》，1913 年 7 月 9 日，版 1）

43 馮自由，〈上海神州日報小史〉，《革命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247。

基本上，徐天嘯的歷史著作是一種族史觀下的敘史，他對於歷史的瞭解與運用，含有濃厚的國族思想，[44] 其曰：

> 世何以有史乎？曰有民族。世界史者，敘各民族之發達及其競爭。國史則敘各民族之一民族之發達及其競爭而已。……競爭優劣強弱之公例定而歷史亦於結胎矣。今日者乃各民族與其他諸民族競爭劇烈之時代也。[45]

他認爲世界史是敘述各民族之間的發展與競爭，而國史則是敘述某一民族之發展。此論點頗符合他自言其第一天職爲提倡民族主義，文中也透露了他對己身以外世界歷史的認識。

徐天嘯不僅有高度的民族情操，書中亦明顯地呈現了強烈的種族主義。他甚至認爲中國境內種族之不融，實爲「吾中國、吾民族復盛之機」，[46] 也就是他有一個單一民族的優越感，他心中的「中國」是漢民族之中國，而中國史者，則爲漢民族之歷史。[47] 他筆下的歷史敘事，基本上是漢民族之興亡史，也就是中國之興亡是以漢族是否掌權而定。其曾曰：「五胡亂華以後，遂令中原土地淪喪於外族，斯誠吾中國千古以來未有之奇恥。」[48] 五胡亂華還僅限於北方，宋明兩代社稷之亡，更被他視爲「中國亡國之痛」，[49] 因此他對繼蒙元之後建立漢人政權的明太祖十分推崇，認爲他是光復大漢之功臣，勸大家都應該「置一太祖之影像於腦經[筋]中，而毋得一刻忘者也」。[50]

---

44 關於 20 世紀初期中國史界革命與國族概念之間的關係，沈松橋已有精彩之論述，見氏著，〈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3（2000 年 6 月），頁 89-107。

45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2。

46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44。

47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43。晚清知識份子重新寫作中國史時，往往將國家人民與中國的位置放在新的種族知識架構之中，梁啟超即是一例。參 Peter Zarrow, "Liang Qichao and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Race' in Late Qing China,"《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2（2006 年 6 月），頁 111-164。

48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66。

49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42。

50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49。

而談到明亡之際，他的言論十分激烈，曾說：「深痛我祖國之亡於漢賊，恨不得起吳（三桂）、洪（承疇）諸賊於既死而手刃之，以謝我祖我宗在天之靈。」[51] 甚至稱清之始祖傳說長白山佛庫倫爲「中國之禍種」。[52] 又說：

> 自滿清入關後，據有我漢土，奴隸我漢人，其虐待我族之痛史，筆不勝述。吾漢人受制於異族帝制之下，俯首帖耳，垂兩百年，洪楊起義，乃專制反抗力之作用，又為吾民族主義發達之動機。[53]

文中充滿仇恨滿清「奴役」漢人、「佔據」漢土，讚揚太平天國「反專制」的種族意識。特別在他所稱的「太平建國時代」，其曰：

> 夫自建虜入主中國以後，故國遺民之起義者，或死或遯。是時兵事少用，國內粗安，滿政府時以籠絡之術愚弄我漢族人民，我漢族人民亦漸相安於異族政府之下，甘做太平之狗，時即有一二熱心之偉人女子，如朱一貴、林爽文、……齊二寡婦，痛神州之陸沉，傷大明之不祀，攘臂崛起，或假明以號召，或用興漢以宣言。而響應者絕少，甚且有加以叛逆不道之惡名者，嗚呼！故國之思已冷，滿漢之界漸融，致令有志者事皆無成，飲恨以歿。蓋民族之不競久矣，而帝王神聖不可侵犯之卑劣思想印於人腦膜也深矣。[54]

徐氏認爲明臣起義失敗之後，國內粗安，漢族人民過著得過且過的日子，少有反抗。他極力喚起人們對故國之思與種族差異的意識，以增進民族的競爭力，推翻專制王朝。他以爲洪秀全以一介平民，略識文字，卻能於明亡百餘年後起義，光復十餘省，建國十餘年，「其聲威所至足以褫滿人之魄，奪滿人之欲，恢復我大漢昔日之雄風。」[55] 在此他完全將太

---

51 徐天嘯，〈發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1。

52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2。

53 徐天嘯，〈發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2。

54 徐天嘯，〈書太平建國史後〉，收於《天嘯殘墨》，頁 19-20。

55 徐天嘯，〈書太平建國史後〉，收於《天嘯殘墨》，頁 20。

平天國的歷史，放在種族仇恨、鬥爭的架構中論述。[56] 但由於本書太著重在太平天國的「反滿戰爭」，續編第二章「太平建國時代」十二節中，僅有六節述及女性，餘半數皆討論太平天國的起兵、成立與失敗。而從太平天國結束到辛亥革命之間這段歷史，在本書則空白。在這樣的論述框架之下，辛亥革命是「種族革命」，是他眼中漢族「出奴入主」之一大轉機。[57]

本書在表達歷史時間的方式上也明確顯示作者的種族意識。「續編」之敘史以「明臣起義時代」代替「明末清初」，目的是「以示明系之未絕，亦竊幸我中國之未亡」；[58] 而以「太平建國時代」代替「清代」的時間指涉；「民國成立時代」則以民國紀元前若干年爲紀年，而非稱清「光緒、宣統」年間。其以明人起義和太平天國作爲時代分段，不以清代的興起或清朝爲分期與名稱，不承認滿人政權，可見在歷史敘述的時間架構上，其所依循的「正統觀念」與反滿種族思想。[59]

除了時序名稱的界定與歷史評價的重心以種族爲圭臬，他定義下的「偉女子」，也是在種族情操之下的選擇，他特別強調對抗異族統治的女性節烈、武德事蹟，例如宋金大戰中，韓世宗妾梁紅玉擊鼓以從戎，慷慨英烈，他稱其乃爲「漢族女界吐氣矣」。[60] 而他認爲明末女子以武烈著稱、爲國犧牲者比前朝爲多，[61] 稱柳如是爲愛國之烈女子，並記載明代魏宮人、費宮人與顧炎武之母王氏殉國。在「死國諸女子」一節，收錄共 30 篇傳記，本書〈續編〉中也補充不少明代的「殉死婦女」。作

---

56 20 世紀初「太平天國」被納入攘斥異族的「民族英雄」系譜之內，洪秀全常被塑造為漢族種魂之表徵。參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頁 123-125。

57 徐天嘯，〈發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3。

58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33。

59 但雖然如此，在「明臣起義時代」部分，他並非只陳述明末抗清與南明的歷史，清代前期的史事也納入其中，例如清人始祖的傳說以及清太宗令愛妾博爾濟吉氏色誘洪承疇投降一事亦述之。但盛清歷史之發展，諸如文化、軍事、外交等等方面，幾乎都忽略。

60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29。

61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23。

者選取大量的明末殉死傳記，在全書比例上有些不均衡，自是其反滿情緒的寫照。此外，他批評沈葆楨之妻林氏等數名女子，「效忠於滿清，未免自殘同族之譏，非民族主義之偉人。」[62] 亦是出於種族情節之語。

另外在辛亥革命時期，本書收錄了許多致力推翻滿清，拋頭顱灑熱血或者慷慨義助革命的女性事蹟，在在凸顯了他將女權與種族革命結合的敘史觀點。例如史堅如之妹熟習西醫為革命、秋瑾壯烈犧牲、吳淑卿成立女子軍、張竹君組織赤十會救療受傷戰士、張善甫夫人發起女子協會、陳也月主持女子北伐隊，陳雪樓夫人女子勸捐會、潘卓群組織女子軍事團等等組織，在他眼中以上皆是「女界救國之熱誠，為吾國歷史上所未有。……即求先進國之女界中，亦無此轟轟烈烈之氣概。」[63] 他還利用陳述清末吳炎娘與吳七娘反清革命被捕時，抨擊詰問的漢官是甘於利祿的「滿清走狗」，[64] 以此突出女子參與革命之慷慨赴義與種族情操。

總之，徐天嘯心中的中國史，實是以漢族為中心的種族興亡史，女子史在他筆下也在興亡對抗的脈絡下呈現，然而反滿歷史是他最關心、痛心的一部分，以致於部分編章為了陳述抗清的事蹟，而忽略了「女子史」的論述。

三、喚起女子：倡導女權

本書首先歌頌 20 世紀的世界是男子與女子公共的世界，也是男女共同構造的世界。他說：「美哉世界，……美哉世界……非男子與女子共同

62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41。

63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85。不過，雖然對於異族統治頗有微詞，他還是記錄了元朝與遼朝的帝系表與婦女事蹟，認為考遼朝史「得賢后、悍婦數人，其事亦有足以懲勸後人者」，故錄之，見徐天嘯，「女史氏按」，《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25。至於記錄元朝的理由則是「以作中國興亡之紀念」，見徐天嘯，「女史氏按」，《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48。看來，他反滿甚過於其他非漢族者。

64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67。

之世界乎？……非男子與女子共同搆造之世界乎？」[65] 強調一個男女共同擁有、共同建造的世界。他並言 20 世紀之時代是「女子飛躍之時代」，[66] 這種認爲 20 世紀爲新時代的來臨，是一個女性可以嶄露頭角的時代，與當時許多報刊所提倡的想法實異曲同工，例如清末《復報》上論者即以爲：「20 世紀爲女權發達之時代」；[67]《女子世界》編者丁初我(1871-1930)也說，20 世紀前之中國爲男子世界，而新的如花似錦之世界是女子世界，「女子世界奚自今日始」；[68] 金一（金天翮，1874-1947）亦曰女子世界出現在 20 世紀初年，「醫吾中國庶有瘳焉」。[69] 陳擷芬(1883-1923)在《女學報》上則論及「世紀」之交之女子角色，強調「吾中國 20 世紀後之女界，爲超越歐美龍飛鳳舞一絕大異彩之時代。」認爲 19 世紀以前女子不成事，尙可諒之，然對 20 世紀之女界，充滿期待。[70]

徐天嘯不斷地呼籲女性獨立，期待打破陽剛陰柔界線。他說 20 世紀是女子飛躍的時代，但中國女子「昏昏焉，憒憒焉，暮氣沈沈，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如大睡而不覺，如大醉而不醒。」[71] 且當時女子衣食生活皆仰賴男子，「既無高尙之旨趣，又無奇特之思想，既無獨立之主義，又無偉大之事業。廉恥道喪，依賴性成。」[72] 其原因在於：

> 自陰陽剛柔、尊卑強弱種種之界說發生以後，男女兩界間，遂劃然分一鴻溝。男子既以陰柔卑弱相待，女子亦以陰柔卑弱自居。一舉也一動也，皆束縛於男子號令之下而不敢有所反背。一衣也、一食也，皆仰給於男子股掌之上而不能自作

65 徐天嘯，〈序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
66 徐天嘯，〈序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3。
67 作者不詳，〈革命與女權〉，《復報》，卷 2（1907 年 3 月 4 日），收於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頁 235。
68 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期 1（1904 年 1 月），頁 1。
69 金一，〈女子世界發刊詞〉，《女子世界》，期 1（1904 年 1 月），頁 2-3。
70 楚南女子 （陳擷芬），〈中國女子之前途〉，《女學報》，期 4(1903)，頁 2、5-6。
71 徐天嘯，〈序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3。
72 徐天嘯，〈序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2。

生涯。……不知羞恥、不知憤恨、不知奮發。[73]

以為歷史上陽剛陰柔、尊卑強弱之界定後，女子於茲束縛於男子之下。他鼓勵女性經濟獨立，當談到宋代謝泌之妻力作自給並能養人，稱其「無依賴性而能獨立生活者歟，賢矣哉？」[74] 希望以此激起中國女性自食其力。

在女子參政部分，徐天嘯鼓勵婦女積極參與政治。他認為民初女子唐群英、林宗素求參政權而有之激烈行為，是女權發達的好消息，指出中國女子有參政的能力在歷史上早有成例，不容否認。他希望「女界同胞急起直追、力圖猛進，以恢復女界固有之權。」當時有人反對女子參政，認為女子並不具備政治知識，他反駁說這些人實不知男女平等，而女性「心思材力，何嘗不若男子？」且認為辛亥革命成功之因，有一半是因為女子之參與，他說：「能破壞者，安知必不能建設？能創造民國者，安知必不能鞏固民國？今日無政治之智識者，安知後日必無政治之智識？」何況「今日政界之男子，亦何嘗人人有完全之政治智識，而二萬萬女同胞，又豈人人無完全之政治智識耶？」[75] 嚴詞駁斥女人不具政治知識不足以參政一說。

徐天嘯雖然主張女性應爭取參政權，但是關於女主或后妃之主政，卻不全然支持。他批評呂后與賈后，認為兩人幾造成漢朝與晉室的危機。他對呂后批評極嚴厲，書中該章節稱為「呂后之亂」，稱呂后是「殘妬」、「無恥」之婦人。[76] 而武則天主政也被他稱之為「武后之亂」，書中寫其淫亂好殺，該章節唐代帝系表中也未列武則天稱帝時期，忽略了武氏主政的事實。然相較於呂后，他稱讚武后「性明敏、善權術，其才足以濟其惡，非呂雉輩所能望其項背，后其女界之曹操歟。」[77] 我們若細察徐天嘯對這些后妃的抨擊，可發現其似非集中在對后妃政治能力之優

73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
74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38。
75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99-100。
76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33-34。
77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93。

劣，而是私德之淫亂好殺，例如他稱「韋后之亂」乃因「后有淫行」。[78] 意即徐天嘯雖然承認女子與男子一樣是獨立的個體，希望女子不要依賴男性，呼籲女子爭取參政權，但他評斷掌權主政的女性時，還是不免受傳統貞操觀點左右。而若是「輔政」的后妃，則歷來受到褒揚，徐天嘯亦相當推崇女性「翼贊」的角色，以爲「中國女子半皆不能盡此翼贊之義務，而徒日斷斷於衣服餽食之瑣事。」[79] 他稱美劉聰后劉娥輔佐有功，又特別讚頌宋朝賢德之后，太后臨朝卻無「女主之禍」，[80] 宋代的劉太后可謂賢后，哲宗時高太后臨朝可稱「女中堯舜」。[81] 也就是說，在他心中理想的女性參與政治，是「關心」、「參加」、「輔佐」政治，若不符合他心中「德行」標準而主政，則遭其撻伐。

在其他女子權利方面，首先在女子教育上，學者曾指出革命派的婦女運動者是最徹底的女學提倡者，他們以女學爲昌明女權的必備條件。[82] 關於此，徐天嘯曰：近數年來，「吾國有志之女子求學外洋者日多一日，是亦女權膨脹之一大原動力也。」[83] 看來應是贊成女子留學教育，但書中並未提及晚清「興女學」的景象，雖然收錄了許多歷代才女的事蹟，但關於其對晚清以來女子受學校正規教育的理念，則不得而知。而在婚姻自由方面，他的態度開放，以爲在歐化的影響下，中國舊禮漸廢，自由婚姻間有行之，他不免追溯中國歷史，認爲春秋時代齊國的徐吾「自擇其夫，爲吾國自由婚姻之鼻祖。」[84]

在女性身體與生育方面的權益，他認爲纏足是「吾國女界之痛史，亦吾國女界之恥史。近今文明女子無不競尚天足，力矯女界積弱之弊。」[85] 批評纏足造成女界之積弱。[86] 有關於墮胎一事，徐天嘯曰：「生育爲女子

78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94。
79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53。
80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35。
81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23。
82 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頁 289。
83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57。
84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6。
85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19。
86 關於近代中國纏足論述的建構，詳參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

對於國家之義務」，但認爲邱公駱夫人吳孟班以爲養子需二十年乃成一人才，教育五年即可成一人才的概念，可見其急於愛才不惜犧牲其子的想法，實值得表彰。[87] 也就是說，無論是女性的纏足或者墮胎，徐天嘯關心焦點的不在女性身體的主動權或者健康，而是基於國族框架的考慮。纏足在他眼中是不文明的國恥；墮胎不符合女子對國家應盡的義務，除非實踐者之動機是爲國家育才，才可避責難。

我們若從近代中國女權概念的脈絡來觀察，近來學者歸納當時女權論述的要點大致有四類：「作國民之母」、「盡與男子一樣義務」、「摸索新角色」與「拒絕做女國民（拒絕在民族國家框架下的女性解放）」。[88] 從這些類型看來，徐天嘯的女權言論，不是屬於提倡「作國民之母」者，比較接近「盡與男子一樣義務」的構想。他所喚起的女性，是要獨立自主並爲國家貢獻的女子，與秋瑾(1875-1907)的想法近似。秋瑾常以古代女傑爲例來宣揚自己的主張，且認爲當時女子在處於黑暗之洞，需被喚起、拯救。她說：「世間有最淒慘、最危險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則無是非，無聞見，無一切人間世應有之思想、行爲等等。」[89] 因爲視中國女界黑暗、危險的前途，她創設了《中國女報》。[90] 秋瑾也曾批評「我的二萬萬女同胞，還依然黑暗，……一生只曉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著男子。」[91] 期待喚起女性同胞脫離依賴男性的局面。徐天嘯同樣希望女性崛起、放光明於 20 世紀中國女子世界之黑洞中。[92]

而如同金天翮等知識份子一般，徐天嘯也是在國族與愛國主義的立

盛極而衰的演變》（臺北：左岸文化，2007）。

87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54。

88 須藤瑞代，〈近代中國的女權概念〉，收於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頁 37-57。另氏著須藤瑞代，《中国「女権」概念の変容：清末民初の人権とジェンダー》（東京：研文出版，2007），第二、三章。

89 秋瑾，〈《中國女報》發刊辭〉(1906)，收於郭長海、郭君兮輯注，《秋瑾全集箋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頁 372。

90 秋瑾，〈《中國女報》發刊辭〉(1906)，收於郭長海、郭君兮輯注，《秋瑾全集箋注》，頁 372-373。

91 秋瑾，〈敬告姊妹們〉（《中國女報》，1〔1906〕），《秋瑾全集箋注》，頁 377。

92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7。

場下推動婦女運動，面對西方帝國主義以及持續了兩百多年的反滿情緒，[93] 他們都將女子啓蒙放在建設新的國族概念中，金天翮即說：「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94] 徐天嘯也是藉由陳述古代奇女子，喚起當代中國女子之奮起。而他們同樣重視中國女性保有貞靜的道德，也正視女性的能力，分別從歷史的事例證之，另也強調女子之生計能力與權力。[95] 但與金天翮《女界鐘》不同的是，徐氏沒有女子爲「國民之母」的論調，也就是如何提高「國民之母」在身體與智識上的素質，以造成國家之強盛，他並未申論，也不高談女子教育之法，亦非「將過去批評得一無是處，然後產生新的革命性的女權主義觀點」，[96] 而主要是抨擊當時婦女之依賴成性。

又，《女子世界》將女權運動匯入種族革命的大潮，由要求女子具備愛國、救國思想，進而把推翻滿清政權作爲中國女性獲得徹底解放的前提。[97]《神州女子新史》亦是，如果從寫作的時間推測，這本書應該在民國成立前一年開始寫作，也就是武昌起義尚未成功，民國尚未建立之時，作者試圖從古代的女性事蹟，激起女界同胞的奮起，推翻異族統治，共同建構或恢復神州。本書「續編」（「專制之末代史」）的寫作時間雖已進入民國元年，然他反滿情緒未消滅，仍致力描述女性參與革命的事蹟，希望繼續喚起女性愛國、愛民族之心。（關於書中所論各種女性典範與標準，詳見下節）

總之，徐天嘯試圖勸勉中國婦女奮起，以先民爲楷模，恢復舊日榮耀，並起而作爲未來人民的模範，[98] 也就是將女性史作爲發起女界革命

93 參王政、高彥頤、劉禾，〈從女界鐘到男界鐘：男性主體、國族主義與現代性（代序）〉，收於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頁 4。

94 金一，〈女子世界發刊詞〉，《女子世界》，期 1（1904 年 1 月），頁 1。

95 參金天翮，《女界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二節〈女子之道德〉、第四節〈女子之能力〉與第六節〈女子之權利〉。

96 參王政、高彥頤、劉禾，〈從女界鐘到男界鐘：男性主體、國族主義與現代性（代序）〉，收於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頁 6。

97 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觀照——《女子世界》研究〉，頁 107。

98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7。

的利器。他從傳統中國追尋「奇女子」，讚揚這些堅強勇健的女性。他與辛亥革命時期宣傳喚醒婦女、推翻滿清的概念最爲相近，即當時女權運動之兩個目的：政治上革命排滿、爭取共和；社會意義上倡導女權，並將兩者相合。[99] 然對於「賢妻良母主義」[100] 與婦女爲「國民之母」的觀點，天嘯則較未論及。而如同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反映了民族主義知識份子的理念，主張創造具有政治參與能力的國民，[101]《神州女子新史》正是在排滿革命、提昇婦女權利的脈絡下，期待創造具有經濟獨立、具有政治參與能力的女國民。誠如學者指出：革命運動在宣傳上將民權與女權疊合，將女權衰微與君主專制統治秩序相連，締造「女傑」這一類新的時代性別範式，而且大多數革命派的女權觀只是移用民權作爲女權的同樣准的，並未考慮獨立的性別權利問題，[102] 徐天嘯即是如此。然若說近代中國婦女運動與女權問題是在模仿西洋與救國保種雙重考量下展開，[103] 從徐氏的女權論述觀之，其救國保種之意圖，比模仿西洋的成分要明顯得多。

四、新史之作：婦女史學革命

（一）「新史學」的國民之史包括女子史？

晚清新史學思潮下，許多學者開始嘗試編寫新體裁的中國史，陳黼宸(1859-1917)即反對以帝王爲中心的寫作方式，主張廢除本紀，並認爲無論是帝王或平民，人人皆可入傳。他設計的中國通史，在列傳方面強

---

99 陳三井主編，張玉法總校訂，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69。

100 關於近代中國賢妻良母的討論，參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另須藤瑞代，《中国「女権」概念の変容：清末民初の人権とジェンダー》，第四章第二節，〈良妻賢母論〉。

101 沙培德(Peter Zarrow)，〈啟蒙「新史學」——轉型期中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收於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2007），頁 53-54。

102 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頁 39、67。

103 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頁 7。

調平民社會生活的考察，人物包含了傳統的「烈女」。[104] 而 20 世紀初期中國史學革命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梁啓超(1873-1929)。

梁啓超提倡「興女學」，[105] 且以國民之史爲論述方向的「新史學」，也就是他重視婦女的權益以及史學的新發展，然他在婦女史方面的見地，恐怕不符合某些人的設想。1901 年在〈中國史敘論〉中，他強調「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106] 並曾論歷史的作用是作爲國民之資治，其云：

> 今日之史，其讀者為何許人耶？既以民治主義立國，人人皆以國民一分子之資格立於國中，又以人類一分子之資格立於世界；共感于過去的智識之萬不可缺，然後史之需求生焉。[107]

既然歷史的讀者爲「國民」，自當撰寫符合其需求之史。又，他說：

>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108]

此揭示「民史」的重要性，樹立了以「國民」爲主體的近代中國國族主義的新史學。[109] 然即使梁啓超曾說過無論男女老幼都當從事史學，其新

---

104 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想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 185-186。

105 梁啟超興女學之言論見，〈變法通議・論女學〉(1896)，收於《飲冰室文集》之一，頁 37-44；〈倡設女學堂啟〉(1897)，收於《飲冰室文集》之二，頁 19-20。本文所引梁啟超之《飲冰室文集》、《飲冰室專集》，皆採用下列版本：《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至於梁啟超的女權概念，另可參須藤瑞代，《中国「女権」概念の変容：清末民初の人権とジェンダー》，第一章與補論。

106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第一節 史之界說〉(1901)，收於《飲冰室文集》之六，頁 1。

107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一章 史之意義及其範圍》(1922)，收於《飲冰室專集》之七十三，頁 37-44。

108 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1902)，收於《飲冰室文集》之九，頁 7。

109 參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另王汎森曾論「國民」、「國家」等詞彙與晚清新史學的關係，從政治概念來看梁啟超的新史學，見氏著，〈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5-48。

史學的論見中，對於婦女史的寫作，並沒有提出創見。綜觀《飲冰室全集》，他只寫了一篇中國婦女的傳記〈記江西康女士〉(1897)，刻畫一位受西方教育的新女性。[110] 然本傳的重點並不是放在描繪康氏一生，而是以之爲例，大論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文中也未提及書寫女性傳記的構想。可知在梁啓超的心中，歷史的接受者與被描寫者是國民，但這「國民」似乎不包括女子（或者說，性別並非梁啓超在論史時會顧及的議題）。顯然倡議新史學的梁啓超，對於爲中國婦女留史，並沒有如同他在倡導女權或者喚醒國民之史那般激昂。或進一步說，梁啓超倡議的「國民」之史，大概不包括中國婦女之史。[111] 若說梁啓超的「新史學」以批評中國傳統史學爲主要基調，並非創造新的史學體例，然他對傳統「列女」傳記的寫作，也無抨擊之聲。民初修纂《清史稿》時，梁啓超指出如「列女」這種過去已有的類型，應該在史書中保留，[112] 並沒有因爲其內容體例不符合新時代之需求而建議將之刪除。

由此觀之，1912 年完成的《神州女子新史》在清末民初中國史學革命的氛圍中，更值得注意。

---

110 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1897)，收於《飲冰室文集》之一，頁 119-120。關於本傳記之討論，可參胡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9（2001 年 8 月），頁 1-29。而梁啟超所寫的女性傳記中，最為知名的是〈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新民叢報》，號 17、18（1902 年 9 月），日本學者松尾洋二曾將此傳放在東亞的脈絡中考察比較，見〈梁啟超と史伝—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精神史の奔流—〉，收於狭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頁 273-281。有關梁啟超對女性史傳之寫作與觀點，涉及層面廣，值得進一步探討。

111 Harriet Zurndorfer 也曾以清代才女王照圓為例，說明梁啟超由於性別偏見以致對其貶低，並忽略其對清代考證學的貢獻。見 Harriet Zurndorfer, “Wang Zhaoyuan (1763-1851) and the Erasure of ‘Talented Women’ by Liang Qichao,” in Nanxiu Qian,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 2008), pp. 29-56.

112 梁啟超，〈清史商例第一書〉，收於朱師轍編著，《清史述聞》（臺北：樂天出版社，1971），頁 136。

(二)女子「新史」之作:從修身教科書到歷史教科書

本書之所以稱作爲「新史」,與本書的性質由女子修身教科書到歷史教科書有關。徐天嘯認爲過去女教書如《女憲》、《女則》、《女訓》、《女誡》等,實汗牛充棟,其採摭古聖賢人垂戒之嘉言,乃是一種「修身教科」而非「歷史之體裁」。[113] 關於「修身」課程之主旨與內容,晚清女子師範學堂章程有曰,修身一科:

> 其要旨在涵養女子之德性,期於實踐躬行。其教課程度,首宜徵引嘉言懿行,就生徒日用常習之故,示以道德之要領;次教以言容動作諸禮節;次教以修己治家及對於倫類國家當盡之責任;次授以教授修身之次序法則。凡教修身之課本,務根據經訓,並薈萃《列女傳》(漢劉向撰)、《女誡》(漢曹大家撰)、《女訓》(漢蔡邕撰)、《女孝經》(唐侯莫陳之妻鄭氏撰)、《家範》(宋司馬光撰)、《內訓》(明仁孝文皇后撰)、《閨範》(明呂坤撰)、《溫氏母訓》(明溫璜錄其母陸氏訓語)、《女教經傳通纂》(任啟運撰)、《教女遺規》(陳宏謀撰)、《女學》(藍鼎元撰)、《婦學》(章學誠撰)等書,及外國女子修身書之不悖中國風教者,擷其精要,融會編成;且須分別淺深次序,附圖解說,令其易於明曉。[114]

可見當時女學「修身」科目乃是節選閨範嘉言、並以漢至清代的女教書爲教材。然徐天嘯認爲,《女範》、《女鑑》、《列女傳》雖採集古女子之行誼事實來紀贊敘述,但那些都是殘編斷簡,對於一人一事之短長得失,以至於列朝事局之變遷、興亡之原因等中國史上「緊要條件」、偉大之人物、外交之得失、戰爭之成敗,均未能約略言之。此如同將無數的女性墓誌集結,實非所謂完整之歷史,而且:

113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2。

114 《學部奏咨輯要》,卷 3,宣統元年(1909)春學部總務司案牘科編印。收於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頁 585-586。

> 其所短長褒貶者，無不依據於陰柔卑弱種種之界說而權衡乎。其間以之束縛女子之身心有餘，以之振起女子之志氣則不足；以之涵養女子之德行則有餘，以之發揚女子之精神則不足。[115]

以爲女教書所搜錄的女性傳記，其褒貶依據實乃根據陽剛陰柔、男強女弱 分野，這種觀點不僅無法激發女性志氣，只能對女性進行道德教育，甚至會束縛其身心。由此可見，徐天嘯所謂的「新史」是相對於以規範女子行爲爲基調的女教書等舊史。[116] 在此明顯可看出他企圖擺脫「閨範」作爲女性傳記寫作的目的，也就是不將女子史等同嘉言烈行事蹟之合集。他將女性置於歷史時間的框架中，並且企圖將人物事蹟與時代發展相關。

又，其自云：

> 史學一科，至為繁重，至為複雜。是書義取別裁，偏重於女界事實，尤屬甚難。吾國自有史以來，凡女界事實之可傳者甚多，至今絕無一系統之女史。而以不文之著者，謬任斯職，亦太不自量矣。至滿清一代史，則更無善本可考，女界事實尤難得其真相。[117]

他有感於過去女性事蹟頗多値得傳述，然「無一系統之女史」，加以當時清史又無善本可以參考，實難以呈現女子之事蹟，所以他彙集史料而成女子新史一書。也就是說，徐氏是有意識地要爲中國女性寫一部專史。

他的這種態度，實與當時開始重視女子習史的概念相呼應，[118] 而吳

---

115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3。

116 而關於 20 世紀女子教科書的研究，可參 Joan Judge, "Meng Mu Meets the Modern: Female Exemplar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Textbooks for Girls and Women,"《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8（2000 年 6 月），頁 133-177。

117 徐天嘯，〈發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4。

118 當時女子師範學堂與女子小學堂都有教歷史，女子師範學堂章程中，歷史一科要旨在：「使知歷史上重要之事跡，省悟群治之變遷，文化之由來，及強弱興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其教科程度，授中國古代至本朝之大事及外國歷史之大要；並授以教授歷史之次序法則。」而女子小學堂歷史科之要旨在於「使知中國歷代重要事實，兼養成國民之志操。其教課程度，則授歷代帝王之盛業，忠良賢哲之事跡，及國民

雙熱評論曰：

> 晚近世女學漸興，間有一二著述家編纂女史以為學校教本，
> 取以比較天嘯所著，便都作陳腐氣，不適於共和國民之用。
> 適於共和國民之用者，當推是書矣。[119]

他稱讚本書最適合新共和體制下的女國民閱讀。學者指出《神州女子新史》曾作爲歷史教科書，[120] 但目前我們尚不清楚本書作爲教科書的使用情形。[121] 然無論如何，徐氏試圖打破「閨範式」地記錄女性事蹟，以「史」的形式呈現，足見其在婦女史學觀念與女子教育內容上，有獨到之見解。

（三）書寫架構：章節體與歷史分期

不僅在內容上本書有創新之意，於外在形式上，也採取了新的寫作格式，亦即清末民初新史學浪潮中興起的一種新歷史編纂體裁——章節體。《神州女子新史》正編分爲四部，下設三至四章，章下分數節。其〈前編〉之結構爲：

第一部　上古時代（第一章太古代、第二章夏商代、第三章周代）
第二部　中古時代（上）（第一章秦代、第二章兩漢三國時代、第三章晉代、第四章南北朝及隋代）；
第三部　中古時代（下）（第一章唐代、第二章五代、第三章宋代、第四章元代）
第四部　近古時代（第一章明代）

〈續編〉則分爲三個時代、三章，分別爲：

文化之由來，並本國與外國之關係。」並強調「尤須使與修身所教授事項，互相聯絡。」見《學部奏咨輯要》，卷 3，宣統元年(1909)春學部總務司案牘科編印，收於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頁 594、586。另參李孝遷，〈論晚清女子歷史教科書〉，《華夏文化》，2007 年 1 期(2007)。

119 吳雙熱，〈序二〉，《神州女子新史》，頁 2。

120 李孝遷，〈論晚清女子歷史教科書〉，頁 23。

121 神州圖書局編有教科書，其中「高等小學歷史教科書」並未列有《神州女子新史》。見《民權報》，1913 年 7 月 15 日，版 1。且本書當時可能未經教育部審定，在《申報》、《民權報》等報紙廣告中所列審定教科書書目中均未見之。

第一章　明臣起義時代（自明末至洪楊起義前）[122]

第二章　太平建國時代（洪楊起義至其失敗）

第三章　民國成立時代（洪楊失敗後至革命軍起、滿清覆滅、共和建設）

此種歷史分期與敘史之方式實呈現了明顯的進化與線性史觀。[123] 而既然強調中華民族的偉大，那歷史該如何說起呢？晚清的歷史教科書通常由起源的故事講起，例如盤古、三黃五帝，[124] 而《神州女子新史》則首述伏羲與女媧，稱女媧是開闢中國史之第一人，也是創造女子史之第一人。[125] 基本上本書「每節之下必繫以一女子或兩個以上之女子姓氏或事實」，[126]「系以年代，以系統每載一人，跋以短評，每終一代，跋以結論。」[127] 亦即以時代為經，人物為緯，每一朝代結束後，附有對該朝代之結論與帝系表。

然章節體與這樣的歷史分期型態並非由徐天嘯所特創，而是清末民初中國史學界關心與使用的新的書寫歷史格式。一般認為新式章節體通史在晚清由日本間接傳入，[128] 此種體例在 20 世紀初影響了中國歷史教科書之寫作。例如夏曾佑(1863-1924)即曾用西方歷史分期與章節體撰寫

---

122 包含明末抗清、南明政權與鄭成功亡後到太平天國時代（康熙 22 年—道光 30 年）一百餘年的歷史。

123 線性歷史觀是西方史學的概念，在晚清由日本傳入中國，例如桑原騭藏《東洋史要》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影響了當時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寫作，其他相關歐、日文明史著作之譯傳，也對近代中國史學分期與進化觀念影響很大，參王汎森，〈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頁 49-58。

124 沙培德(Peter Zarrow)，〈啟蒙「新史學」——轉型期中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頁 64-65。

125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2。

126 徐天嘯，〈發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4。

127 神州女子新史廣告，見《民權報》，1913 年 7 月 9 日，版 1。

128 特別是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與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見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於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535。然也有學者指出在此之前即有美國傳教士(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所著的《萬國通鑑》，其第一章論中國事略即是以章節體寫中國史。見李孝遷，《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9。

《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1904-06，上海商務印書館），[129] 該書將歷史分爲三個階段，每一「世」再分爲二期至三期：

上古世：自草昧至周末（1.傳疑之期：草昧至周初；2.化成之期：周中葉至戰國）

中古世：自秦至唐（1.極盛之期：秦至三國；2.中衰之期：晉至隋；3.復盛之期：唐）

近古世：自宋至清（1.退化之期：五代、宋、元、明；2.更化之期：清代）[130]

他對中國歷史的分期，主要是依據文化思想，借用西方史學的分段法，同時又結合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勢而定。[131] 徐天嘯之分期點與之稍異，他認爲明代才是「近古時代」，夏曾佑則以爲近古當從宋代開始。又，20 世紀初，中國歷史編纂有一「現代轉型」，亦即由「朝代史」轉向「國史」的寫作模式，學者紛紛從國史的視角，記述「國家」的歷史、集體而非個人行爲的歷史，有些學者並期待歷史的分期可取代朝代分段之概念。[132] 從這個角度看來，徐天嘯的寫作與這波史學變革密切相關，即試圖從一種新的歷史分期架構，書寫集體的、中國的婦女歷史。

此外，本書每節後附有類似傳統史傳論贊的「女史氏曰」。例如〈續編〉〈康有爲之女 （保皇黨失敗）〉一節，正文說道康有爲女康同璧：

精史籍，通西文，有為嘗至印度，同璧孑身獨行，以省其父，時吾國女子之遊歷海外者，雖已踵起，而西遊印度者，同璧實第一人也。同璧有詩曰：「若論女士西來者，我是支那第一人。」此詩即其省父印度時所作也。[133]

其後在女史氏曰的部分，徐氏進一步評論康同璧遊印度此事，認爲其時

---

129 1933 年國民政府將之訂為大學歷史教科書，更名為《中國古代史》。

130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頁 5。

131 馬金科、洪京陵，《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 192。

132 余英時，〈20 世紀中國國史概念的變遷〉，收於余英時著，何俊編，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2008），頁 565-575。

133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57。

年僅 19 歲，獨身省父「亦豪也」，並引伸其閱讀某君筆記之心得，感嘆「吾國女子之有雄魂、有毅魄、有冒險進取之至性、有救國利民之熱腸者，不知凡幾。」[134]「女史氏曰」乃是作者對前文人物事蹟的補充、評論與感嘆。

要之，本書在「外部」形式上，選擇了近代中國新式國史寫作架構，新的章節體體例與歷史分期，而非傳統以政治朝代史爲中心的紀傳體來寫作，然內容還是以類似歷朝人物傳記的型態來表述各時代的歷史進程。徐天嘯將女性事蹟放入男性史發展的框架中，而非將女性置於時序與論述的主軸，作爲歷史敘述的動因。每節尾端附上仿舊史的論贊「女史氏曰」，傳達作者對前節敘述的人與事之評論。可見無論是在體裁運用與論贊史評等方面，本書俱呈現了新舊史學交融的痕跡。女性人物的選擇亦如是，詳述如下。

（四）女性典範的塑造與評價

若要問本書選擇人物的標準，它在女性典範的評價與塑造上，採選了千載以來的「賢豪之女子」，如：

> 或建偉大之事業、或垂優美之名譽、或任家庭之教育、或抱明決之見解、或懷慈善之心腸、或秉貞潔之德性、或尚雄武之精神、或具愛國之思想。[135]

也就是具有事功懿行之女性，或別具母儀、識見、慈善之心、貞操、武德精神與愛國的女性，以革女界陰柔之故習、以洗女界卑弱之奇羞。[136] 此外，才女也是本書褒揚的重點之一，例如傳經的伏生孫女、「吾國史學界之偉女子」班昭、辛憲英、謝道蘊、劉臻妻陳氏、宣文君、蘇蕙、唐代宋棻五女等等。書中所收錄的女性包含了社會各階層，有后妃、官宦之妻女、娼妓、乳母，甚或「無名氏」，例如南宋一位宮廷婦女，由於

134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58。
135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
136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

不知其姓氏，稱之為「告變之女嬪」。[137]

《神州女子新史》所列舉的女性楷模，在過去女教書籍中多半可見，然徐天嘯特別強調是「義烈」與「武德」二類型。例如在春秋時代吳宮女兵一節末曰：「婦人女子豈皆不足造就軍人之資格哉？」[138] 稱女性非不具尚武從軍之資質。三國時代孫夫人好武藝，他稱之為「英婦人」。論及晉朝，其曰：「女子以義烈武德者，如李秀之破夷、惠風之罵賊、荀灌之乞師、朱序母之御秦兵、陶潛妻之不忘故國，皆以忠肝義膽俠骨慈腸。」[139] 又稱木蘭乃奇女子、俠女子，為「吾女史上空前絕後之大人物」。[140] 在唐代婦女一節，他說道「婦女之能兵事者，如朱序母、孟太妃、劉夫人、洗夫人、花夫人、平陽公主等」。[141] 又舉郭澄母與苟金龍之妻之有魄力、智慧、才識，呼籲男性勿輕視巾幗。而明代婦女中「有烈性而且有武德者」，除秦良玉外，亦有遇吉之夫人等等。[142] 另外，清代白蓮教女首領齊二寡婦，「異常勇猛」，帶領部下軍士男女；太平天國的蕭三娘「勇悍善戰，率女兵百餘人」。[143] 由此可知，書中紀錄了不少義烈、武德之婦女，顯示徐天嘯對此類婦德之推崇。

而其記載武德之女性目的在於：「洵足為女界光，洵足為吾中國之女界上，一洗柔弱無能，依賴成性之恥。」[144] 民國肇建時有女子革命軍之興起、有女子北伐隊之組織，有女子募餉團、女子救傷隊等等，[145] 他認為「其愛國之熱誠、尚武之勇氣，即求先進國之女界中，亦難得其人。此豈僅吾女界之光？亦吾中國之榮也。」[146] 也就是說，他竭力從歷史中挖掘女性勇敢尚武的事蹟，女性之武德若出於愛國之心的表現，並壯烈

137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32。
138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9。
139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67。
140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79。
141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39。
142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71。
143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36，頁 41。
144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67。
145 徐天嘯，〈發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3。
146 徐天嘯，〈發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3。

犧牲，更爲其所推崇。作者期待在國家興亡之際，喚起匹婦奮起赴義。無怪乎時人陸麗芳曰：「千百年後，乃有一有心人，出爲古今來女子鳴不平，爲古今來女子大叫屈，爲古今來女子開闢一雄飛世界」，稱本書爲「神州女子雄飛史」。[147]

根據學者研究，晚清知識份子編造了兩套主要的「民族英雄系譜」，分別爲「抗禦外族」與「宣揚國威」兩種模式；[148] 而本書的選擇，並非只是塑造抵禦外侮的民族「英雌」，[149] 而是強調「尚武」精神，也就是各種巾幗英雌皆是他頌揚的對象。在二十五史列女傳記與大多數的女教書中，武德並不是強調的重點，僅有《魏書》、兩《唐書》、《金史》稍提及，其他僅僅零星幾例。[150] 徐天嘯這種提倡女子尚武的態度，在清末民初十分盛行，例如〈詹壽恆上女子尚武會書〉有曰：

> 滿清既經推倒，共和竟達目的，此固男界同胞數十年之孤詣苦心，千回百折有以致之。然我女界同胞或赴前敵救護，或組軍隊北伐，對於軍事雖不過涓埃之助。……我國女子素稱懦弱，為世詬病，今因革命起義精神為之一振，超越古史。現在政體已決，軍事方休，然時勢造成之精神仍須維持不可稍弛。……[151]

也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提倡女子尚武的風氣仍不減。

另外，徐天嘯認爲先民最優美、最高尚而爲他國女子所萬萬不及者爲「節烈」。[152] 書中所選例如魏晉時代的皇甫夫人罵董卓、王惠風拒喬

---

147 陸麗芳，〈書後〉，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2。陸麗芳為女子參政同志會會員，見《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101。

148 詳參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頁 77-158。

149 近代中國民族英雌之塑造，是否也有前述學者所稱類似的民族英雄系譜，及其書寫與社會文化、史學之關連性，實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150 詳參拙著，〈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第二章第二節。

151 見《民權報》，1912 年 4 月 5 日，版 10，廣告。至於中國自古到明清時代女子尚武的書寫，可參合山究，《明清時代の女性と文学》（東京：汲古書院，2006），第四篇第一章，〈明清時代にわける巾幗鬚眉の系譜——女將軍・從軍女性・女武芸者・女豪傑とその文化〉，頁 519-575。

152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6。

屬之私而被害都屬烈女；唐代奉天竇氏二女、趙元楷之妻、孟才人、朱延壽之妻；宋代的王貞婦、譚氏；元代的潘妙圓、王烈婦；明朝的胡廣女、鄭成功母等等。他特別認爲明代「賢婦貞女之優美歷史，凡我後生當奉爲儀型典式者。」[153] 他的「貞節觀」在爲李定夷(1890-1963)《茜窗淚影》作序時，表現得最爲清楚，他說：

> 女子之美德之最難能而可貴者，其惟節乎？然節亦常事耳。人生不幸為女子，女子更不幸為嫠婦。……古往今來名節完全之女子，何可勝數？此吾國女界之特色，亦國家之光榮也。[154]

意即他認爲守名節是中國婦女的特色，國家的榮耀。他還批評曰：

> 自歐化東漸以來，一般少年女子，定力未堅，往往誤解自由之真義，鄙夷其固有之道德，任情縱性，蕩檢逾規，即不至人盡可夫，而離婚再醮，視為正當之行為，恬然不以為怪，更不知名節為何物矣。[155]

徐天嘯稱美節烈行爲，不贊成離婚再醮，這樣的女德觀點，實爲千百年來女教書、正史〈列女傳〉所頌揚的女德典範。由此，他所褒揚的義烈武德精神，加上對節烈行爲的表揚，實足以構成一部「熱血澎湃」的女子「流血」史。

而在婦德典範中，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推崇的「賢妻良母主義」，也就是經由教育女性使其爲賢妻良母，作爲輔助家內使國家走向強國強種的想法，在本書並不明顯。他所搜錄的女性，仍是傳統中國女教類型爲多。而若問書中收錄的賢母或良妻多，則是賢母，如勸勉向善的孟母、何無忌之母；智母王陵陳嬰之母；講求忠義的趙苞母、范滂母，姜敘母、趙昂妻；雋不疑母、嚴延年母寬刑的仁母；勸清廉的崔元暐母等等。而像漢代楊敞妻具膽識勸楊敞果敢立宣帝，以及樂羊子妻之勸善，天嘯稱之爲「妻教」，作爲賢妻之典範。

153 徐天嘯，「女史氏按」，《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69。
154 徐天嘯，〈《茜窗淚影》說部序〉(1914)，收於《天嘯殘墨》，頁 45-46。
155 徐天嘯，〈《茜窗淚影》說部序〉(1914)，收於《天嘯殘墨》，頁 45-46。

徐天嘯對所謂的「女禍史觀」，仍稱「女禍可畏」，[156] 並稱明末流寇釁起於婦人，洪承疇降清也由於婦人之引誘，吳三桂乞師滿清入關亦由於一婦人。認爲「明之亡國，中國之淪於異族，其因皆由於女禍。」[157] 但他對歷來人們所稱的「紅顏禍水」型人物另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他認爲夏朝的妹喜實爲報父之仇，妹喜乃「孝女俠女兼而備之」。[158] 而西施「忍辱事仇」，實爲「俠女子」。[159] 關於婦言，他以爲商紂以用婦言而身死國亡，晉伯宗以不用婦言而身死家滅，質疑婦人之言難道都不足取？[160] 對此，他的評價稍有超越傳統對紅顏禍水與婦言誤國批評的窠臼。

在中西女性典範方面，徐天嘯不免將中西女範作一比附，例如在書中結論稱：

> 主持大局、提倡風化於國計民生上有絕大關係者，如女媧之正婚姻，嫘祖之教育蠶，馬后之崇節儉，長孫后之獻可替否，高太后之舉賢斥佞，馬皇后之輔濟仁慈，非中國之「維多利亞」乎？[161]

在此將漢代明德馬皇后、唐代長孫皇后與明太祖馬皇后等對比爲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其次，他以爲妹喜、妲己、褒姒、西施是「含垢忍辱，屈體事仇，隱以一身爲犧牲，而父之仇卒以報，國之恥卒以雪者」，爲中國之「蘇斐雅」。另有天性友愛，自甘苦辱以揚弟之名、成弟之事而勉其禍患。如聶嫈（榮）之殉弟、曹姑之上書、文姬之匿弟等，可稱爲中國之「罷賴茵」。[162] 還有慈善爲懷，熱心公益如巴寡婦之捐財免役，乃中國之「批茶」。[163] 又，其曰：

> 至若絹女之鼓楫，緹縈之上書，曹娥之投江，龐娥之礪刃，

---

156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8。
157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8。
158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6。
159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8-19。
160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4。
161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3。
162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4。
163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4。

> 荀灌之乞師，木蘭之從軍，王舜之踰垣，盧氏之冒刃，顧妻之跪桑，張女之禱天，諸女之臥板，石女之自經，王女之斷指，孝女俠女，千古流芳，彼「路衣慈之孝養盲父」何以過之？
>
> 而且，傳經有伏女也，續史有班姬也，觀書有二喬也，謝女有詠絮之才，劉妻獻椒花之頌，衛夫人創簪花之格，宣文君之升堂講周官，宋若昭之入宮為女教，要皆才德兼美，學識並優，又豈「盧月」輩所能頡之、頏之者哉？[164]

但在此他僅說明中國也有不少像西方女傑一樣的典範，有類似路衣慈之孝養盲父，也有像法國盧月一般的才女，證明中國史上亦有能建立一番事業的女性。他在序中略提過以上西洋女性人名，在結論又作一呼應，並沒有要挪借西方典範、以西方楷模爲中國依歸的意思，更沒有輕視中國女德楷模的意味。

關於 20 世紀初期的女德楷模，學者處理當時中國所見的中西女性傳記，曾以四個時序類別來區別這些史料的特性，分別爲：永恆類 (eternalist)、社會改革類(meliorist)、原始現代主義類(archeomodern)與現在主義類(presentist)。永恆類者將古典婦德視爲永恆不變，反對新的、外來的女德價值觀；社會改革類也著重在中國女性典範，但抨擊節烈行爲，認爲人的情欲不應被犧牲；原始現代主義類則崇拜西方女傑，給予中國女德新的評價，視傳統才女爲中國文化之恥，關心國族主義下的女才；現在主義論者則鄙夷過去，將婦女與國家連結，最稱讚巾幗英雄與西方女革命家。[165] 然綜觀《神州女子新史》的女德塑造，似乎無法歸納於這四類型

---

164 徐天嘯，〈結論〉，《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4。

165 Joan Judge,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pp. 12-16. 學者也指出晚清以來的國族主義者對婦女問題表現出一種父權態度，其表述方式是將婦女作為恆本永真(authenticity)的核心，放在一個國族線性歷史描述的模式中，呈現的是沒有時間變化且目的相近的女性面目，參 Prasenjit Duara,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7:3 (August 1998), pp. 299-308. 關於婦女與恆本永真的關係尤可參氏著, “Of Authenticity and Woman: Personal Narratives of Middle-Class Women in Modern China,” in Wen-c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之一，徐天嘯雖稱美許多古來的孝女貞婦、賢妻良母，但他非如永恆類拒絕新的女德（例如女子參政權與婚姻自由）；他讚美節烈精神，所以不算是社會改革論者；而他雖稱讚幾位西方女傑，但也歌頌中國傳統才女，並非原始現在主義類；他更沒有像現代主義者鄙夷過去的中國婦女。當然我們也可以這麼說，《神州女子新史》的內容實包括許多所謂的永恆類型的女德故事，但在國族富強的旗幟下，其呼喊帶有原始現代主義的傾向，進而言之，其崇尚的義烈、武德特質，則爲現在主義者所關注的焦點，但最大的不同是，他以民族過去的優美女德爲豪。

（五）本書史料運用與侷限

整體而言，本書參考了相當多的資料，例如《左傳》、[166] 正史的〈列女傳〉（例如明代月娥、丁錦孥、石孝女、王妙鳳皆是來自《明史．列女傳》）。還參考了《東華錄》、筆記野史如《閫雜記》、《因話錄》等，[167] 或許因此他選取的人物同見於正史，但其事蹟陳述卻與正史不同，例如書中關於房玄齡之妻的事蹟即非來自《新唐書．列女傳》的記載。徐天嘯還徵引不少當代的一手資料，更向大眾廣徵清代與當代事蹟，寫作本書「續編」期間，徐枕亞即曾以民權報館爲址，爲其兄登廣告，徵求革命女子與清代「女界偉人」事蹟。[168] 又書中民國成立時期引用了女子協會之通告、孫中山大總統蒞任之宣言、女子北伐隊之緣起、吳芝瑛與陳也月及邵心綺的書信、女子勸捐會啓等等，足見其使用史料類型之多元。

當然本書也有一些瑕疵，首先在體例上，部分不整齊，例如〈正編〉第二部第三章「晉代」，前十五節紀錄晉朝女子義烈、武德之個別事蹟，第十六節名爲「晉代之婦女」，內容則是十三位賢德女性傳記，分節標準模糊。「唐代婦女」一節亦是。其次，許多節的內容與女性無關，例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342-347.

166 他說《左傳》之書言女子之歷史最詳，貞淫互見、賢否並錄。徐天嘯，「女史氏又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10。

167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97。

168 〈徵求革命女子事實〉，見《民權報》，1912 年 11 月 14 日，版 1，廣告。然此廣告一連刊登了一個半月之久。

如〈續編〉第一章第十節，「唐王之即位」、「魯王之監國」、「遺臣之起兵」，第十四節「浙東之失守」、「魯王之出亡」、「張國維之殉國」、「馬阮之罪惡」，都非關女子。第三，書中一人兩傳者：遼太后與聖宗后重複；明代王貞女與顧亭林之母實為同一人。這些重覆的傳記，內容不同，顯然由於參考自不同史料所致。第四，由於不是修身教科書，書中女性傳記並不是個個作為婦德典範，有些僅是奇聞軼事，如琵琶行中的潯陽妓；或只是跟女性相關的事件而被附帶一提，例如唐代張巡守睢陽城，城中飢荒，張巡殺妾；還有唐代昇平公主與駙馬（郭子儀子）爭吵一事被立於「昇平公主」一節等等，納入書中之用意不強。

然本書內容有時文題不相稱，例如〈虞姬（項王之失敗）〉一節，以虞姬為標題，內容卻主要談項王之失敗；[169] 有時他以事例為敘述主體，非標題所示之女性傳記，例如〈雋不疑母（張騫之通西域及霍光之輔政）〉一節，他先論張騫之通西域及霍光之輔政，再將同時代的雋不疑母簡傳接續其後，此與兩則史事完全無關。[170]

此外，本書收錄由古至民國千載以來的女性傳記，不免有所疏漏。[171] 由於不重視「滿清」，以致於書中關於盛清歷史之發展，諸如文化、軍事、外交等等方面，相較於對他朝的陳述，幾乎都被忽略。且因集中在反清之事例，也忽略了許多清朝之才女與貞節烈女，如梁端(1793-1825)、王照圓(1763-1851)等人皆未納入。對此，作者曾解釋道：「滿清兩百餘年間，女子之以武烈著者，以貞節聞者，以文學藝術名者，何可勝數，吾書不及備載，姑俟諸世之作列女傳者。」[172] 而太平天國時代與女性相關之制度或禁纏足等政策，徐天嘯亦均未論及，知名的洪宣嬌在書中也沒有傳記。雖然他自知婦女參與革命之事蹟仍很多，期待將來補充發

---

169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29-31。

170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正編，頁 35-36。

171 本書廣告即自云：「本集搜輯雖廣，遺漏之處在所難免，還乞海內大家有真知確見，或貞節、或淑德，凡有益於世道者，不妨開具事實函告。俟本局調查得實，即於再版補入。」《民權報》，1913 年 7 月 9 日，版 1。

172 徐天嘯，「女史氏曰」，《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111。

揚，[173] 但辛亥革命乃其寫作時期，清末女革命志士早期以宣傳爲主要活動，[174] 出版刊物宣傳革命的女性實不容忽視，如陳擷芬主辦《女學報》，倡女權、反纏足、倡女子教育、介紹外國女界與鼓吹種族革命，被視爲是女子宣傳革命的第一人，[175] 她曾在〈中國女子之前途〉頌揚花木蘭從軍，並稱滿族爲異族，「殘酷我同胞、斷送我土地」，呼籲婦女「愛國愛種」，[176] 其與徐天嘯的論調十分相合，實應納入書中。

總之，徐天嘯所收錄的女子事蹟，承繼了過去長期以來婦女史書寫重視的貞節烈女、孝女、賢妻、良母的傳統，並在傳統的土壤中，特別強化義烈與武德二項。過去列女傳記固然曾零星介紹類似的女性事蹟，然未有如清末民初知識份子，這般積極地挖掘中國女性尚武的形象。[177] 徐天嘯之婦女史之書寫，實有強烈的革命精神與民族／種族情操。本書與當時女性傳記書寫的目的與風格相符，20 世紀初期不少報刊雜誌皆登有女性傳記，《女子世界》中即載有節烈孝女、賢母良妻、特立獨行、文章靈秀、俠義與善武之女，柳亞子(1887-1958)即曾以「亞盧」爲筆名在《女子世界》發表過花木蘭、梁紅玉等人的傳記。這些刊物的史傳欄亦試圖藉由女性的傳記來激發讀者的民族與革命情操。學者也發現晚清婦女期刊中的女性傳記實配合國族意識而轉變，特別以對社會有貢獻的女傑(social heroines)與女勇士兩種形象爲主，[178] 徐天嘯本書亦如是，提倡義烈或慈善事蹟，都是有益於社會的女傑，鼓吹別具武德的女勇士，皆爲強調對國家社會貢獻己力的女性形象。

我們可以發現對中國史上女傑的重新挖掘與列舉，可說是革命派知

---

173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續編，頁 4。

174 參林維紅，〈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動(1905-1912)〉，頁 129-178。

175 參林維紅，〈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動(1905-1912)〉，頁 132。

176 楚南女子（陳擷芬），〈中國女子之前途〉，《女學報》，期 4(1903)，頁 1-4。

177 而誠如柯惠鈴所言，女傑實是革命運動中的一種婦女典型想像，「俠」的精神之強調，見氏著，〈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頁 51-59。

178 Joan Judge, “Expanding the Feminine / National Imaginary: Social and Martial Heroines in Late Qing Women’s Journals,”《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1-33。

識份子試圖藉由重塑既有的傳統而成其期待之現代。與強調「賢妻良母」異曲同工，都是晚清改革者基於救國於危溺的前提下，改造女性而重新拼裝的性別形象，這些形象在傳統當中都可以找到因子，卻在清末民初被賦以藉此喚起婦女貢獻家國的現代目的。

可惜的是，本書在民初似未受到普遍注意，[179] 即使 1928 年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在〈維新時代的婦女生活〉一章徵引了《神州女子新史》三個片段：在「為革命犧牲的女子」一節，他轉引徐書所載某君筆記提到中國女性在日本的題壁詩；而「為戀愛犧牲的女子」一節他稱吳其德是新式戀愛犧牲的第一位女子，事蹟參考自《神州女子新史》；另外在「從軍的踴躍」一節，談到吳淑卿上書黎元洪，力辯男女無別，願投軍效力一事，也是來自《神州女子新史》〈續編〉。[180] 然此後，一般所知的民初中國婦女通史著作，幾乎都以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為代表，忽略了徐天嘯的著作，十分可惜。

五、結　　論

若從地域來看徐天嘯撰著《神州女子新史》一書的背景，常熟地處上海、蘇州與無錫的三角中心，在清末民初新知識與新訊息的傳入較為快速。其次，該地在晚清民國興女學、創女子報刊與女知識份子的興起方面，都有不少成果。例如 1904 年，丁初我與徐念慈(1875-1908)即在常熟組競化女學校；丁氏並創《女子世界》雜誌，[181] 常熟女界湯雪珍等人亦曾在該刊為文倡議女權，喚起女性同胞追求獨立自強。[182] 其他常熟女子如胡靜芳(1844-1937)曾組天足會，反對婦女纏足，並致力於女子教育，

179 其原因有待考察，或許隨著時代推演，反滿的主張，已不是熱潮，又或者跟神州圖書局經營問題有關。目前史料不足，尚未能定論。

180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臺一版第 10 刷），頁 351-352、355-356。

181 該刊由「常熟女子世界社」出版，在目前已知的 30 多種清末女報中，是歷時最久、冊數最多者，相關研究見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觀照——《女子世界》研究〉。

182 湯雪珍，〈女界革命〉，《女子世界》，期 4（1904 年 4 月 16 日）。

任女子勸學會會長；宗秀松(1888-1928)曾讀常熟競化女學，民初任海虞市女子初等小學校長，重視體育教育等等。[183] 徐天嘯於其時當有所聽聞與接觸，激發其女權意識。特別是《女子世界》爲一部反滿革命色彩濃厚的婦女刊物，與他的理念十分相近。到了上海，更有蓬勃的倡議女權之活動與訊息，其服務的《民權報》即登有相關廣告，例如〈男女平權維持會通告〉曰：

> 本會以破除一切專制，尊人道主義，維持男女平權，抵抗強權惡習，振興工藝，提倡實業為宗旨。對於女子生計上種種之進行，莫不竭力提倡。[184]

該會重視女子生計，正是徐氏所關心的女權之一。

從婦女運動的發展看來，清末以來各個不同時期的知識份子，無論是洋務派、維新派到「高舉革命排滿旗幟、謀求建立共和政體」的革命派，都關心婦女，試圖藉此找出中國積弱的原因。[185] 女性在近代中國往往代表衰弱與中國「問題」，而成爲中國現代性的代表與象徵。[186] 徐天嘯利用寫史來呼籲人們重視婦女，蒐集羅列女性在中國歷史上的身影，特別是以歷史上「尚武」的女性來喚起中國婦女的奮起，打破其陰柔卑弱的形象。在他筆下，當代中國女性大多居於黑暗之中，僅有少數參與革命流血之勇士；古代女性則有不少遵行貞烈的高度情操，發揮愛國精神、帶領抗賊並俠義犧牲的女傑。蔣箸超(1881-1929?)曾云此書收羅之宏

183 參虞山鎮志編纂委員會，《虞山鎮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 24 編〈人物〉，頁 871、882。

184 見《民權報》，1912 年 4 月 3 日，版 5。

185 陳三井主編，張玉法總校訂，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67。

186 然梅嘉樂(Barbara Mittler)認為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傳媒論述中具有現代性的可能性、對立性、矛盾性與模糊性，女性代表了現代性，但常常也被塑造為傳統形象，又挑戰了她所代表的現代性，見氏著，〈挑戰／定義現代性：上海早期新聞媒體中的女性(1872-1915)〉，收於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7），頁 255-310。Joan Judge 則利用世俗化、全球化與時間化三個概念來討論中國的現代性，並思考女性傳記如何被用來承載晚清時人達到現代性的目的，見 Joan Judge, “Introduction,”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富，體例之精深，是「女界之圖書府」亦「女界之過渡筏」。[187] 而徐天嘯藉由整理歷代女性事蹟來陳述過去，重新強化武勇與節烈等婦德來邁向新時代的道路，多處顯現的是他面對 20 世紀來臨與國族危機的焦慮，以過去女傑來喚起當代女性對抗滿族、奮起革命，並發洩他不滿的共和國政體。

本文研究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一書，亦可尋繹近代中國轉型時期中歷史書寫形式之變化。1911 年辛亥革命一方面可視爲轉型期，也可視爲奠基期；[188] 徐天嘯約於此時寫下章節體的中國婦女通史，呼籲女界革命，實早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所強調的新史學。而當時女性史傳的產生，大抵在喚醒種族革命與強調男女共同肇建民國的背景下產生，知識份子試圖從歷史中找尋一些愛國、俠義、具「武德」的女性事蹟，尤其是不斷地重新編寫明末抗清的女性故事；待民國建立以後，他們發現同樣身爲國民的女性，在歷史的洪流中卻面目不清，於是又努力挖掘清末民初女性的事蹟。從這個角度看來，清末民初對女性歷史的追溯，即使是在女權與種族革命的背景下來運用、闡釋，爲國族服務，然這般積極地整理女性事蹟，可說是中國女性史首次全盤被注意的時刻，比我們熟知當代史學界尋找女性身影的風氣，至少早了半世紀之久。

由中國婦女史書寫的脈絡看來，傳統朝代史列女傳記在選材方面基本上以節烈爲尚，而各史在主基調貞節烈女之外，另有次偏重之女性德行，例如賢母等，但從未以武德爲讚頌婦德的主軸之一。[189] 婦德在徐天嘯的闡釋下，有了不同的側重與運用，他保留節烈作爲女子史的重要內容，加上羅列武勇義烈的婦女，構成他心目中中國婦女的主要兩大優美

187 蔣箸超，〈序一〉，《神州女子新史》，頁 2。

188 Peter Zarrow, “Introduction: New Discourses and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China,” in Peter Zarrow, ed.,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 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 1900-1940*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pp. 7-10. Joan Judge 也認為 20 世紀初期的幾年，實為我們瞭解當代中國的基礎，見氏著, “Conclusion,”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189 詳參拙著，〈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第一章第三節與第二章第二節；另，〈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臺大歷史學報》，期 41（2008 年 6 月），頁 180-181。

德行。

在書寫方式上，他不像歷代〈列女傳〉或女教書寫作，將女性以德行作爲分類而羅列之（例如：母儀、貞女、烈婦、孝女等），記載也不完全以女德教化爲主旨，而是敘述這些女性的各種「事蹟」。學者曾指出晚清許多女性傳記已經改變了女性傳記原本的主旨（典範作用），朝向以之作爲歷史教育、國家發展的工具，使讀者傾向從過去各式各樣自我犧牲的模範中轉變爲具有英雄氣概的、對未來自我奉獻的主體。[190]《神州女子新史》正是這樣的特質。然徐天嘯所挑選的女性事蹟不見得都跟教化有關，有些看來是他將所知的女性故事羅織在時代發展的脈絡之下。這些故事固然與時代脈動不一定有所關連，但是我們也看到本書從傳統「列女傳」寫作轉向非以女德而以時代發展爲論述框架的章節體「女子新史」的嘗試。其後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以婦女爲歷史敘述的主軸，雖然是在「壓迫與解放」的框架下論述，但其敘述內容並非雜亂無章，更不是以婦德爲主要論述方向，使中國婦女史的寫作又邁向了眞正的「專史」，直到今日我們仍以此作爲大學相關課程之教科書。

總之，本文分析辛亥革命時期出現的一本重視種族革命、喚醒女權的新式婦女史著作，筆者以其書名「神州」對應其種族「革命」、「女子」對應其「女權」主張、「新史」對應其「史學」觀念，將之放在婦女運動以及婦女史學史的脈絡中考察，以見其特色。期盼此研究對於瞭解 20 世紀初期以革命語言來撰寫中國婦女史，以及用寫史來倡議女權的作法，有所助益，並使我們進一步省思婦女史書寫在民初新史學氛圍中的意義。

---

190 參 Joan Judge, “Expanding the Feminine/National Imaginary: Social and Martial Heroines in Late Qing Women’s Journals,” pp. 5-7.

徵引書目

一、史料（報刊、檔案、史料集）

《女子世界》。

《女學報》。

《民權報》。

《婦女雜誌》。

《新民叢報》。

《學部奏咨輯要》，宣統元年(1909)春學部總務司案牘科編印。收於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雙料伍銅元》。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周文曉編，《徐天嘯與徐枕亞研究資料》。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3。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郭長海、郭君兮輯注，《秋瑾全集箋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二、專書

合山究，《明清時代の女性と文学》。東京：汲古書院，2006。

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

李孝遷，《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李曉紅，《女性的聲音——民國時期上海知識女性與大眾傳媒》。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

金天翮，《女界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想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1。
范培松、金學智主編，《插圖本蘇州文學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
徐天嘯，《天嘯殘墨》。臺北：廣文，1980。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臺北：稻鄉出版社，1993。
馬金科、洪京陵，《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臺北：左岸文化，2007。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陳三井主編，張玉法總校訂，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臺一版第 10 刷。
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
陳明遠，《何以爲生——文化名人的經濟背景》。北京：新華書局，2007。
馮客(Frank Dikotter)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須藤瑞代，《中国「女権」概念の変容：清末民初の人権とジェンダー》。東京：研文出版，2007。
虞山鎮志編纂委員會，《虞山鎮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Judge, Joan.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三、論文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爲中心的討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49-108。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5-48。

王政、高彥頤、劉禾，〈從女界鐘到男界鐘：男性主體、國族主義與現代性（代序）〉，收於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1-29。

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衣若蘭，〈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臺大歷史學報》，期 41，2008 年 6 月，頁 165-202。

余英時，〈20 世紀中國國史概念的變遷〉，收於余英時著，何俊編，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2008，頁 565-575。

李孝遷，〈論晚清女子歷史教科書〉，《華夏文化》，2007 年 1 期，2007，頁 21-23。

杜芳琴，〈中國婦女史學科化建設的理論思考〉，《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 1-26。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 28，1997 年 12 日，頁 1-77。

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3，2000 年 6 月，頁 77-158。

沙培德(Peter Zarrow)，〈啓蒙「新史學」——轉型期中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收於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2007，頁 51-80。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於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513-573。

松尾洋二，〈梁啓超と史伝—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精神史の奔流—〉，收於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頁 257-295。

林維紅，〈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動(1905-1912)〉，收於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129-178。

林維紅，〈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動(1905-191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

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臺大歷史學報》，期 16，1991 年 8 月，頁 139-180。

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胡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啓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9，2001 年 8 月，頁 1-29。

夏曉虹，〈晚清女性典範的多元景觀——從中外女傑傳到女報傳記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 年 3 期，2006 年 5 月，頁 17-45。

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觀照——《女子世界》研究〉，《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2004，頁 67-113。

高彥頤，〈把「傳統」翻譯成「現代」：《女界鐘》與中國現代性〉，收於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1-36。

梁啓超，〈清史商例第一書〉，收於朱師轍編著，《清史述聞》。臺北：樂天出版社，1971。

梅嘉樂(Barbara Mittler)，〈挑戰／定義現代性：上海早期新聞媒體中的女性(1872-1915)〉，收於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7，頁 255-310。

馮自由，〈上海神州日報小史〉，《革命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

須藤瑞代，〈近代中國的女權概念〉，收於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37-57。

鄭逸梅，〈《民權報》與民權出版部〉，《書報話舊》。北京：中華書局，2005。

魯迅，〈准風月談後記〉，《准風月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收於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2，頁 266-295。

Duara, Prasenjit. "Of Authenticity and Woman: Personal Narratives of Middle-Class Women in Modern China," in Wen-c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342-347.

Duara, Prasenjit.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7:3, August 1998, pp. 299-308.

Judge, Joan. “Expanding the Feminine / National Imaginary: Social and Martial Heroines in Late Qing Women’s Journals,”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1-33。

Judge, Joan. “Meng Mu Meets the Modern: Female Exemplar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Textbooks for Girls and Women,”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8，2000 年 6 月，頁 133-177。

Zarrow, Peter. “Introduction: New Discourses and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China,” in Peter Zarrow, ed.,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 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 1900-1940*.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pp. 1-21.

Zarrow, Peter. “Liang Qichao and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Race’ in Late Qing Chin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2，2006 年 6 月，頁 111-164。

Zurndorfer, Harriet. “Wang Zhaoyuan (1763-1851) and the Erasure of ‘Talented Women’ by Liang Qichao,” in Nanxiu Qian,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 2008, pp. 29-56.

Revolution, Women's Rights and Historiography: On *Shenzhou Nüzi Xinshi* (New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Jo-lan Yi

Abstract

It has been commonly accepted that *A History of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written by Chen Dongyuan in 1928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 o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However, i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prior to its publication, Xu Tianxiao (1886-1941) had written his *Shenzhou Nüzi Xinshi* (New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1913,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first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few scholars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is book.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book are: first, it fit women's history into an anti-Manchu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framework; second, it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women's history meant only writing about women's virtues but rather believed that history could inspire women; and third, it used the new chapter style of organization instead of traditional annals-biographical style. Therefore, this book offers us insights on how literati used Chinese women's history as a medium to invoke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allows us to review the role of women's history i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movement of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Key Words: Xu Tian-xiao, *Shenzhou Nüzi Xinshi* (New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women's history, women's right, revolution, historiography